

## 导 论

决定论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前沿的重大课题，而且也是当今哲学论坛和社会实践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透视其原因，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世纪之交，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的大变动、大调整时代，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主要问题。早在本世纪 50 年代末，西方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其论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从逻辑和方法论的角度，重点对唯物史观提出责难，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表述为“《旧约全书》式的预言”、“历史的神化”断言马克思以历史规律为依据对社会主义前景的伟大构想是乌托邦。今天，面对世界政治形势的新变化，西方学者又迅速作出应变。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声称：资本主义的永世长存和社会主义的衰败同样都是历史的必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把历史归结为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否定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的差别和对立。

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的敌视和对抗、东西方文化的摩擦和契合，既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又给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以注重历史基本走向为底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和方法，正确地回答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在日益复杂化的世界政治经

济环境中选准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当今世界历史中的坐标点，最终主宰自己的历史命运，使社会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迎接西方学者的挑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近年来，国内学者以此为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笔耕不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推动了这一理论向纵深发展。但是，由于对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缺乏深层的历史考源与分析，因而，在诠释和判定决定论、特别是历史决定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方面，歧义横生。这种状况，使人们难以在理论形态上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展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完整体系，显示其理论强大的逻辑力量，完成时代赋予的重任。为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历史的源头来理清决定论的脉络，进而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完整内容。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哲学史好比“真理的根”，“围绕‘真理的根，挖掘总是有益的’”。因此，通过概要地论述和阐释西方哲学史上决定论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内在规律，如实地界定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丰富的内涵，就成为这部著作的根本宗旨。



毋庸置疑，在哲学史上，决定论未曾以严整的哲学概念或完备形态的哲学体系的形式存在过，况且，也不能把所有的哲学家都简单地、机械地划归为决定论者。虽然在相当多的哲学家那里，决定论的思想十分丰富，但是也难免在少数哲学家那里，决定论思想还不是他们哲学体系的主流，或许还只是哲学体系所表达的主流思想的附带因素，或许仅仅在某些个别问题上表现出决定论的倾向，甚至个别哲学家对事物的发展持非决定论的立场。然而，只要不为细节所限，撇开使决定论的历史线索模糊不清的次要成分，排除那些打断决定论思维进程的不必要的曲折和偏离，就能够在逻辑层次上比较客观地展现决定论发展的历史。

那么，什么是决定论？笔者认为，决定论是一种承认一切事物、现象受因果性、规律性和必然性支配并由此而决定事物、现象发展的秩序性、确定性和规则性的理论。对此作出否定回答的则是非决定论观点。决定论由于表现在自然和历史不同的领域中，从而划分为自然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两种形式。在持决定论观点的各个哲学家那里，有关决定论的哲学基础、决定论的核心内容、决定作用的实现方式等问题各有不同的看法，表述亦不尽相同，由此形成形态各异的决定论观点。

决定论概念这一最基本的规定，一方面是历史考察的结果，它是纵观哲学发展史，在最抽象、最一般意义上概括一切决定论观点的共同特征而得到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决定论史由以展开的起点。伴随着历史的不断延伸，决定论逐渐获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科学的规定，因此，这一定义不是决定论概念的终极规定。

## 二

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决定了人类是对自然现象的朴素认识开始决定论历程的。两千多年来，自然决定论经历了从古代朴素决定论、中世纪神学决定论、近代机械决定论向德国古典理性决定论的历史演进。

古希腊罗马的朴素决定论奠定了西方决定论史的开端。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对决定论问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自然领域：即宇宙万物从何而来？是何种力量支配着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的运行秩序？这既是本原问题，又是因果性问题。因果观念是决定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观念之一，寻找世界最终根源或“终极本质”的努力，使本原具有了“始因”、“终因”的性质。在古代，由于理论思维水平低下、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缺乏，决定了具体事物的因果规律还不能为具体科学所揭示，更

不能以自然科学经验材料为依据，以哲学思维的高度如实揭示世界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把整个世界看成发展变化的整体，用一种或几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具体的基质直接作为宇宙秩序、自然进化的原因和根据，这种论证方式，隐含着决定论以后在性质上分裂的种子，造成了古代决定论特有的直观性、猜测性和辩证性质。

最早的唯物主义者把物质性的东西看成万物生灭的原因和支配宇宙命运的力量，从自然本身而不是从超自然的神中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表现了最初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基本倾向。但是，他们无法说明，有限的、具体的物质形态何以能成为无限发展的自然界生灭的根据。毕达哥拉斯把数从事物量的属性中抽取出来，赋予它以非感性的、抽象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代替了用具体的物质形态对万物存在根据的解释，导致了对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否定，开创了唯心主义决定论发展的历史，标志着人们对事物因果关系的认识上升到了必然规律的高度。但是，决定万物的本原数，毕竟只是事物一种有限的属性，有限原因与无限结果之间的逻辑缺陷并未弥合。爱利亚学派把无生无灭的、无限的、唯一的、高度抽象的自体——存在，作为宇宙万物背后的共同本质，然而，他们唯一能做到的仅仅是消解矛盾：既然存在永恒无限、无生无灭，也就无所谓“始因”问题；既然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彼此隔绝，那么，自然哲学家设定的本原与万物的因果关系也不再具有现实性质；既然现象世界是虚幻的、暂时的，那么人们也就无法用理智去把握现象世界的深层本质（因果规律）。爱利亚学派不仅没有解决矛盾，而且取消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生灭的原因问题。

原子论者力图解决这一矛盾。他们把具体有限的物质本原化解为数量无限、性质相同、形状各异、不能再分的原子，在用原子抗拒爱利亚学派把感性世界变为虚无的同时，把存在具有的普

遍本质赋予原子，合理地用原子量上的差异解释了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根据。他们还第一次提出了必然性的概念。德谟克里特指出：“一切都遵照必然性而产生。”<sup>①</sup>他们进一步把因果性与必然性联系起来，赋予因果关系以必然的属性，表现了对因果关系研究的深化，对此，德谟克里特强调：“漩涡运动既然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也就是他所说的必然性。”<sup>②</sup>他认识到必然性与因果性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内在联系，看到了因果必然规律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有此水平的认识，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他还不懂得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把必然性等同于因果性，否定了偶然性的客观存在；把偶然性看成是人们不了解事物产生的原因而形成的主观观念，看成是人们捏造出来的偶像，其目的在于掩盖自己的轻率。这样，随着因果关系的普遍化，原子论者就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现象视为必然的、命定的，从而开辟了哲学史上机械决定论的先河。早期原子论者的缺陷，在晚期原子论者伊壁鸠鲁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伊壁鸠鲁明确肯定“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偶然性的产生也是有原因的，它是由脱离直线运动轨道的偏斜运动所导致。从此，因果观念便与必然性和偶然性联系起来，扩展了决定论的内涵，深化了对必然规律的理解，为人们更深刻更圆满地解释和说明各种现象，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把唯物主义决定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原子论者把无限的原子本原作为同样无限的万物存在的依据和变化的源泉，似乎使矛盾得到解决，然而，随着希腊哲学研究主题从自然向人事的转变，这种解释方式的缺陷日益显露出来。问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47 页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sup>②</sup>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47 页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题在于：物质性本原的原子何以能成为与它性质不同的正义、秩序、意见等观念变化的内在原因？何以能直接主宰人类历史的命运？仅从原子量上的差异何以能揭示变幻莫测、和谐巧妙、性质各异的自然界的必然秩序？柏拉图把理念看成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认为通过对理念世界的“分有”和“摹仿”就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外部世界。理念不仅是事物的原因，而且也是世界万物追求的目的，世界上的万物都追求最高的“善”的理念，“善”就是上帝，就是支配和创造万物的最终原因，这样，柏拉图就构造了以“至善”为顶点的宇宙等级秩序。他以目的论原则与因果性原则的妥协调和，填平了爱利亚学派的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作为原因的理念世界和作为结果的现象世界的统一，形成了古希腊哲学史上理念论唯心主义决定论与原子论唯物主义决定论公开的对抗和冲突。

亚里士多德以宏伟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决定论的一切成果，扬弃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决定论的僵硬对立，使古希腊决定论第一次达到了高度综合。他不再直接把无限本原作为同样无限的万物的原因，而是从本原所辖的万事万物的关系中寻找事物发展的因果规律，较为彻底地解决了自然哲学家设定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矛盾，确定了本体论与决定论相对独立的地位。在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潜能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考察中，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因果必然规律和趋势，使希腊决定论达到了全面的、系统的、接近完成的程度，当之无愧地登上了希腊决定论之巅。但是，亚里士多德在唯物主义决定论与唯心主义决定论、辩证因果观与机械因果观、因果论与目的论之间的折衷调和，又使其理论常常陷于矛盾和混乱之中。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决定论貌似全面完整，实际上恰恰缺乏自我独立性，缺乏自己内在的生命力，缺乏对时代精神的深

层理解，因此，决定论发展的顶峰也就是它衰落的开始。以皮浪为代表的后期希腊罗马怀疑论哲学，对事物发展的因果必然规律统统加以怀疑、反驳和否定，得出了非决定论的结论。非决定论就在亚里士多德决定论哲学内部尖锐化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激烈冲突中逻辑地产生了。从此，整个希腊决定论哲学开始走下坡路，虽然不乏有伊壁鸠鲁对决定论问题的真知灼见，但是，这并不能扭转决定论衰败的命运。决定论作为对宇宙终极命运的关切的哲学理论，不满足于对未来的消极否定，随着希腊奴隶制的江河日下，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必然代替非决定论的，是一种从柏拉图神学中发展起来的、神秘主义的基督教教父哲学。这样，基督教神学决定论登上了中世纪哲学的王座。

基督教神学决定论是欧洲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教父哲学是它的最粗糙、最原始的表现形式，奥古斯丁是教父哲学的著名代表，他笃信主宰万物的上帝“从一无所有中”创造了世界，上帝对宇宙万物的统治是必然的、“永恒的规律”，假如没有上帝的天命，“就是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脱落下来”。自由和偶然性均为上帝所垄断，这种决定论无疑是宿命式的。建立在教父哲学基础上的经院哲学是神学决定论最精致、最发展的形式。经院哲学“举世无比的教师”托马斯·阿奎那，从五个方面对上帝存在进行了所谓宇宙论证明，确证了上帝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第一推动者，是事物之间因果链条上的最初因，是自身具有必然性又赋予事物生灭以必然性的最高存在者，是事物秩序排列的最高原因，是万物追求的最终目的的信条，使基督教神学决定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封建社会末期，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和唯实论两种哲学思潮或流派的激烈纷争、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实验科学的萌芽和发展，导致了神学决定论的彻底瓦解。

公元 15 世纪至 18 世纪，西欧历史在革命中实现了从封建制

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家面向自然，注重实验，发展科学，在摆脱神学决定论的束缚中，克服了古代决定论的朴素性质，剔除了中世纪决定论的神学杂质，创造出适应资产阶级革命需要的、以自然科学为依据的机械决定论哲学，开辟了西方决定论史上的新纪元。

毫无疑问，神学决定论的产生，揭开了决定论史上最黑暗的帷幕，但是，它并未造成决定论发展的空白地带，许多有价值问题的提出和阐发，使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古希腊决定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达到顶峰之后迅速衰落，盲目信仰代替了理性思维，古代朴素决定论被中世纪神学决定论所否定，在社会革命和自然科学革命中产生的近代机械决定论又是对中世纪神学决定的否定，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神学决定论恰恰构成了古代决定论向近代决定论过渡的桥梁。决定论演变的历史充满了曲折和偏差，舍此，便无理性思维的成熟和凝重，便无决定论内在不屈的生命力，便无决定论史的延伸。

近代机械决定论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 15 世纪末到 18 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的多数部门正处于分门别类的搜集材料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被裸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sup>①</sup> 自然科学最初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近代决定论在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

其一，把自然现象分解为各个部分，分门别类地、孤立地对其进行观察和实验的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引入哲学，并上升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形成了决定论在这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4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时期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

其二，牛顿力学由于其巨大的成就被誉为当时自然科学的典范，于是，人们把物体之间做力学运动所具有的因果规律扩大到自然界的一切领域，坚信这种具有可预言性的、可重复性的、单线的因果关系完全能表达自然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结果使近代决定论具有了机械性特点。

如果说在 16、17 世纪的西方各国哲学中，决定论的形而上学、机械论性质在其理论中占主导地位，那么，在 18 世纪法国哲学中，哲学家们一扫前期唯物主义决定论哲学中的神学、唯心主义因素，把机械决定论推向极端。

近代决定论在比以前任何时代更广阔、更深厚的自然科学背景上展开了自己丰富的内容。

因果观念是决定论的核心内容和鲜明标志。在因果关系问题上，近代唯物主义决定论者主要用机械作用解释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正如霍布斯所说：“当一个物体借推动另一个物体前进而在这另一个物体里产生了运动时，就被称为‘动作者’，里面像这样产生了运动的那个物体，就被称为‘被动者’。”<sup>①</sup>也就是说，霍布斯把因果关系归结为机械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给予运动的主动者是原因，接受运动的被动者是结果，原因永远是主动的、积极的，而结果则永远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由于世界上每一个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原因，因而，整个世界就构成了一条有始有终的因果链条。在这一链条中，“凡是在第一个与最末物体之间的那些物体就都既是动作者又是被动者，而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 86 页，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第一个只是动作者，那最末一个只是被动者”<sup>①</sup>。霍布斯看到了处于因果链条中间的那些物体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但由于缺乏对因果关系的辩证理解，使他的因果观具有神学的不彻底性，他在事物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之外设定的“第一个只是动作者”同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神学决定论的上帝十分相似。

唯心主义决定论者贝克莱，抓住了唯物主义机械因果观的缺陷，指出，既然物质是没有能动性的单纯被动的东西，那么，何以能产生物与物的作用？何以会有起作用的原因和受作用的结果？由此，他认为作为唯物主义因果关系基础的物质只是一个“假设”或虚构，因果关系只不过是神用来使我们通晓事物的“符号”或“标记”，自然因果律也不过是上帝印入人心的一些规则，他公开提出“上帝的宗旨就是自然规律”的口号，从唯心主义决定论倒向了神学决定论。

法国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决定论、神学决定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把整个世界描绘成由种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事物构成的因果序列，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任何活动的余地，真正把唯物主义决定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必然性观念是决定论内容的展开和深化。近代唯物主义决定论者，把因果性与必然性联系起来，使因果关系上升到普遍必然规律的高度，既深化了因果关系的研究，又拓展了决定论的理论视野，把古代德谟克里特的这一思想系统化了。但是，由于不懂得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把不同场合中原因的作用等同看待，视一切结果的出现为必然，其结果是：(1) 把因果性等同于必然性，否认偶然性的产生也是有原因的，抽去了偶然性的客观基础，把偶然性看成无知的表现，走向了极端因果决定论。霍尔巴赫写道：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 87 页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宇宙本身只不过是一条由生生不已的原因和结果构成的链条。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必然的。”<sup>①</sup>因此，“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contingens)反之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以一定方式存在和动作”<sup>②</sup>。(2) 否定偶然性的存在，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的偶然性，导致了对科学的否定。在霍尔巴赫看来，自然界中只有必然性，没有偶然性，就连在一阵狂风中所卷起的尘土的漩涡中或在掀起巨浪的暴风雨中，也没有一粒沙、一滴水是随便摆放的，它们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他们形而上学地割裂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抛弃了以前决定论的辩证因素，造成了近代决定论无法弥补的缺憾。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是决定论哲学研究的根本宗旨和归宿。历代决定论者致力于对必然规律的探求，就是为了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获得行动的主动权。近代唯物主义决定论在阐释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批判否定必然性客观基础的唯心主义决定论以及把意志自由绝对化的非决定论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由于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机械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也导致了对人的自由的彻底否定。霍尔巴赫就主张，人的自由纯粹是一种幻想，因为“人在他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是在必然性掌握之中的一个被动的工具”<sup>③</sup>。在他们看来，整个宇宙就像一台巨大无比的机器，它按自身固有的规律周而复始地运转，人的意志对它无法施加影响，人的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割裂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无法找到一条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595 页，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②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 27 页，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

③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 71 页，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这样，在机械决定论那里，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一方面，他们用唯物主义决定论对抗神学、唯心主义决定论，要求面向自然，发现并驾驭自然规律，以提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反对神学决定论对人性的贬损；另一方面，又以其机械决定论的观点，否定了人的主体地位，抹煞了人的特殊本质，甚至把人看成机器，导致了历史宿命论。

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否定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独占鳌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注定了机械决定论无法超越自身，走出时代设定的怪圈。于是，机械决定论借助于对自身的否定走向反面——理性决定论。理性决定论在时代的呼唤中走进历史。

德国古典理性决定论是西方自然决定论的终结形态。从近代机械决定论向德国古典理性决定论的历史转变具有双重性质：就决定论的存在基础而言是一种退步，它毕竟由唯物主义决定论退化为唯心主义思辨决定论，但是，就决定论的实现方式而言的确是一种进步，它实现了从机械决定论向辩证决定论质的飞跃，开始了理性决定论辩证发展的历史。

康德把有关自然和社会的一切知识限定在理性范围内，采取把规律理性化的方式，抽掉了规律的客观基础。在自然领域，他**主张：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sup>①</sup>但人颁布给自然的只是普遍的先天规律，大量的特殊规律有赖于向经验学习，唯有此才能掌握规律。他强调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人们所能认识的只有现象前后相继的因果必然规律，物自体是否有规律不可知。在社会领域，理性又为人的实践行为立法。在康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能时刻意识到道德的千钧威力，并服从理性颁布的先天的、客观必然的、绝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 93 页，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对的法则，以期达到一个以道德为最终目的的至善世界。康德把规律的根源归于理性，为理性决定论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费希特清除了康德决定论中的经验内容，发展了康德自我意识的能动方面，把理性自我看成客观世界及其必然规律的创造本体，彻底打碎了主观先天形式的因果规律与物自体相互隔绝的屏障，建立了以理性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决定论哲学。

谢林把理性规律推广到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把世界及其规律看成不自觉的绝对精神的产物，实现了理性决定论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型，奠定了黑格尔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决定论的前史。

黑格尔高度综合了以前决定论的一切成果，从“理性统治世界”这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原则出发，把“绝对理念”看成是自然界的真实基础，而自然界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展开和实现，在“理性”本体下，总结了他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把自然界描写为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并以逻辑的形式试图把对立统一辩证法、质变量变辩证法和否定之否定辩证法概括为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第一次形成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庞大、最宏伟的理性自然决定论体系。

但是，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整个德国自然决定论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他们把自然规律看成是理性规律，并要求自然界必须与之相适应，这就颠倒了世界的真实关系。

理性自然决定论发展到黑格尔就终结了。尽管费尔巴哈用自然规律代替了理性规律，把决定论建立在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上，使唯物主义决定论登上了德国哲学的舞台，但由于其决定论哲学的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特点，使他无法超越黑格尔理性决定论哲学，从而成为近代机械决定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无论如何，德国理性决定论宏伟大厦中有无数辩证法的珍宝，特别是费尔巴哈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直接促进了既唯物

又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决定论的诞生。

从近代机械的自然决定论到德国古典理性的自然决定论，从德国古典理性的自然决定论再到马克思主义自然决定论，构成了西方自然决定论史上的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

### 三

同自然决定论相比，历史决定论起步很晚，当人类由于物质生产的需要，开始揭示自然现象的奥秘时，对自身活动的规律、动力和目标的认识尚处于浓厚的神学迷雾之中。如果说，在自然领域，自然决定论由于其内部唯物主义决定论和唯心主义决定论的冲突、借鉴、吸收而依次经历了几种形态更迭的话，那么，在历史领域则完全不同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产生之前，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一直占统治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充满了谬误和成见，毫无成就可言，恰恰相反，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如同历史本身的进步一样，处于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中，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就经历了从神学历史决定论、人性历史决定论到理性历史决定论的发展过程。

历史决定论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规律和历史过程的研究远未达到哲学思维的层次上，那时，还谈不上历史决定论的发展史。古希腊哲学家笼统地把永恒不变的本原或始基看成宇宙万物循环运动的“逻各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还不能把自然和社会区分开来，社会被包容于自然之中，成为自然的简单延伸和扩大，丝毫没有给历史研究以独立的地位。这种状况，决定了人们还不能从自身的历史中概括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反，只能从历史之外把超自然、超历史的上帝看成人间吉凶祸福、民族兴衰荣辱、社会制度更替的根本力量。中世纪神学家用超自然的神的意志和力量解释历史自身的必然性的神学历

史决定论在中世纪处于统治地位。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的神学家都主张，一切历史事件和社会的等级秩序皆出于上帝的有意安排，除了上帝，没有偶然性和自由意志的存在，人只不过是上帝手里随意摆弄的棋子。这种神学历史决定论与神学历史宿命论别无二致，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神学历史决定论很难被称为历史决定论，因为它的一切推论都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不是从人类自身的历史中发现的。但是，同古希腊人的历史循环论相比，它仍有着某种历史的进步性质。奥古斯丁在《论神之都》中，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上帝的信徒和魔鬼的信徒两大阵营，坚信人类的历史就是两种信徒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局是：上帝的信徒必然胜利，永恒幸福的“神之都”必将出现。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历史走出循环，走向进步。神学历史决定论者走出了古希腊人狭隘封闭的历史视野，以某种“世界历史”般的宽广胸怀，把积极向上的品格赋予历史，奠定了西方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基础。

然而确切地说，只有近代人性历史决定论才真正拉开了西方历史决定论史的序幕。

人性历史决定论决不是纯粹抽象的历史概念逻辑推论的结果，它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资产阶级的普遍革命密切相关的。从 15 世纪开始，西方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市场，掠夺东方财富，进行了海上探险活动，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冲破了民族史、区域史的狭隘界限，发现了作为人类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存在，使人们有可能提出并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问题；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的革命，也迫切需要用历史发展的普遍原则为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资产阶级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革命，即文艺复兴运动，使神的历史变成了人的历史，人们不再从神的意志，而是从人自身中引出历史的必然性原则。这一切，使历史决定论的研究重心实现了从神性向人性的必然转变。

意大利 17 世纪思想家维科是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开创者。他反对直接用神的旨意解释历史，在《新科学》一书中他写道：“以往哲学家们倾全力认识自然界，这个世界既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能认识；同时，他们却忽视对民族世界的思考，这个世界既是由人类创造的，那么，人类就能认识它。”<sup>①</sup>在维科看来，人完全能够认识自己创造的历史，根本不需要上帝的启示。历史有自己的规律，正是这一规律决定了一切民族都要经历一定社会结构的发展阶段，都不可避免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而历史规律的依据就是人类共同的本性，即一切民族都具有的共同起源和特征。尽管历史的发展在细节上充满了种种偶然性的曲折和偏差，但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使世界上一切民族具有了大致相同的基本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

维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未达到唯物主义的理解，更不可能找到历史规律。在他那里，人创造了历史，人是历史的前提。那么，人是何物？从何而来？如何而来？由于他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把人归结为上帝的创造，结果是，上帝成为历史的开始，上帝的旨意成为历史的基础和达到历史目的的动力，最终未能从神学决定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

法国启蒙学者不满足于维科用外在于历史的神的天命对历史规律的吞并，强调人类自身如同自然事物一样，受不变的客观规律支配。孟德斯鸠指出：“人，作为自然实体，是和其他物体一样，受一些不变的法支配的。”<sup>②</sup>他们从社会环境，即人类自身都具有的风俗、道德特别是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中寻找历史“不变的规律”。问题在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人的精神风貌又渊源于何处？

维科：《新科学》，第 33 页，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sup>②</sup>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 40 页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18 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和唯物主义者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阐释。

孟德斯鸠从人类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地理环境中寻找答案。在他看来，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是一个民族精神风尚、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决定力量。启蒙学者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抹煞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根本区别，否定了历史规律的特殊性，就无法从人类自身中发现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孟德斯鸠不是在历史之外的神中，而是在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中寻找历史之谜，毕竟是历史认识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

法国 18 世纪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反对孟德斯鸠对地理环境作用的过分夸张，在他看来，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在历史上，尽管某些民族的地理环境始终如一，但民族精神、政治法律制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从地理环境无法对历史发生的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他另辟蹊径，不是从远离历史的自然条件中，而是从历史中，从历史主体一分子的立法者的意见中，揭示社会环境变化的根据。爱尔维修认为，贤明的立法者能造就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相反，昏庸无能的立法者订立不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会产生恶劣的社会环境，因而是人的观念决定了社会环境。可是，何以会有贤明与昏庸的立法者之分？他回答，皆由社会环境所致。他强调，人的智力天然平等，“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的教育所致”<sup>①</sup>。这样，爱尔维修就陷入不能自洽的二律背反之中：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人的观念决定环境”。

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19 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甚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467~468 页，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